

花生文库·建筑馆

建筑师 不是描图机器

——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城市规划师陈占祥

对今天大多数人来说，陈占祥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

他，留学英伦，随名师研究都市规划学。

1949年前，他为南京规划了“中央政治区建设的计划大纲”。

为上海提出“开发浦东”的建议。

1950年，与梁思成共同提出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7年，被错划为建筑界的“两大右派”之一。

……

这里有陈占祥本人的亲自讲述，

有亲朋好友的往事回忆，

有不堪回首的“历史档案”……

这是一位城市设计（规划）师、建筑师，怀揣着一颗滚烫中国心，
丰富、曲折、多舛的人生故事。

陈占祥等/著
陈衍庆 王瑞智/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花生文库·建筑馆

建筑师 不是描图机器

——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城市规划师陈占祥

陈占祥等 / 著
陈衍庆 王瑞智 /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城市规划师陈占祥/陈占祥等著; 陈衍庆, 王瑞智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7

ISBN 7-5382-7502-9

I. 建… II. ①陈…②陈…③王… III. ①陈占祥-回忆录②陈占祥-文集
IV. 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9882 号

书 名: 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城市规划师陈占祥

著 者: 陈占祥等

编 者: 陈衍庆 王瑞智

责任编辑: 马旭东 李忠孝 徐 悦

特约编辑: 俞静贤 赵 华

装帧设计: 翁 涌

出版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700×1000)

13.5 印张 160 千字

印 数: 1—6000

定 价: 28.00 元



陈占祥先生（1916-2001）

驚悉占祥我師噩耗

惜哉西學中用 開啟規劃之先河 先知而鮮為人知
痛哉歷經苦難 敬業無怨之高士 高見又難合眾見

學生周于峙敬悼

辛巳二月三十日

原建设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周于峙先生书写的挽联：

“惜哉，西学中用，开启规划之先河，先知而鲜为人知；痛哉，历经苦难，敬业无怨之高士，高见又难合众见。”

目 录

1	陈占祥生平	
4	陈占祥自传	陈占祥
30	陈占祥晚年口述	王军整理
39	首都政治区建设计划大纲草案	陈占祥、娄道信
45	环路、交通与总体规划	陈占祥
47	关于北京市的城市规模	陈占祥
50	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	陈占祥
58	忆梁思成教授	陈占祥
62	我对美国城市规划的印象	陈占祥
67	在第一届首都建筑设计汇报展览会专家座谈会上的 发言	陈占祥
70	雅典宪章与马丘比丘宪章述评	陈占祥
	附录：1) 雅典宪章	
	2) 马丘比丘宪章	
91	爸爸和我的童年	陈愉庆
121	忆爸爸	陈弥尔
134	我的岳父	周一民
141	外公的故事	周 泉
148	深切怀念老友陈占祥	贺其治

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

154	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友谊	林 洙
157	怀念陈占祥先生	马国馨
164	一棵吹不倒压不垮的迎风松	邱连璋
167	西方文化的启蒙老师	陈卞知
170	蓓蓓的妈妈和爸爸	吴小珊
175	建筑师还是描图机器?	陈占祥
178	关于纠正 1957 年《建筑学报》对华揽洪、陈占祥 两同志的错误批判问题的声明	
	附录：“反右”时期对陈占祥部分批判言论摘录	
	1) 捍卫党对建筑界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2) 深入开展建筑界的反右派斗争	
	3) 驳斥陈占祥对规划管理工作的污蔑	
	4) 从市政规划和市政建设上反驳陈占祥对北京市 总体规划的污蔑	
	5) 我们全体技术人员坚决反对陈占祥的反党言行	

陈占祥生平

陈占祥先生 1916 年 6 月 13 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奉化县。1929 年至 1934 年在上海澄衷中学学习；1935 年至 1937 年在上海雷士德工学院建筑构造专业学习；1938 年赴英国留学，1944 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士、城市设计硕士学位；1944 年至 1945 年攻读英国伦敦大学都市规划博士学位。在英国留学 8 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向英国各界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参加演讲活动。1944 年，他师从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专家“大伦敦计划”主持人阿伯康培爵士，协助和参加完成英国南部三个城市的区域规划，获得好评，同期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会员。

1946 年南京政府邀请陈占祥先生回国主持北平城市规划工作，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优厚待遇返回祖国。回国后任南京政府内务部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兼中央大学建筑系和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主持完成南京“行政中心”规划方案（与娄道信合作提出《首都政治区建设计划大纲草案》）。曾任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在 1947 年即提出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同期与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黄作燊等著名建筑师成立“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等职。1950 年，他与梁思成教授共同提出关于“新北京城”建设规划的建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极具远见卓识。1951 年，他和梁思成教授竭力主张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中国传统“碑”的方式为主体的设计方案，得到采

纳和实施。他先后主持完成北京市建国门外使馆区等工程设计，其中北京南礼士路社会路（现月坛南街）沿街建筑群的设计，吸取西洋古建筑手法又融合中国建筑细部，突出建筑群体的节奏感，具有清新、向上和生机勃勃的独特风格。1954年，陈占祥先生调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任副总建筑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直至“文革”期间，曾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仍兢兢业业做力所能及的信息研究和实际工作。自1962年起，他翻译了大量包括赖特等现代建筑大师的著作和大量国外建筑与城市规划技术信息资料，为我国建筑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调任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任顾问总工程师，兼任《城市规划》杂志（英文版）主编。他多次参与深圳特区、上海、杭州、兰州、海口及川北等城市和地区的规划方案的研究与审议，提出重要的建设性意见。同时，他继续翻译和介绍国外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如《马丘比丘宪章》、《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城市设计”条目等，并多次出访、出席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介绍中国城市规划经验和建设成就。1986年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编辑委员会委员，并参加编写及审阅部分条目。1987年退休。1988年应邀赴美国，他先后担任加州伯克利大学“摄政”教授、康乃尔大学和威列寇斯大学访问教授，堪萨斯大学授予他“埃德加·斯诺教授”称号。1989年回国。1992年国务院为表彰陈占祥对发展我国工程技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

陈占祥先生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事业五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十分重视城市规划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注重研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论和方法，注重“洋为中用”；他强调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强调城市规划的区域理念，倡导建筑设计 with 城市规划的协调统一，以及注重研究城市土地的开发效益等学术思想，至今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他著有《中国建筑理论》（英文版）、《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英文版）和《预制混凝土墙板》（译著）等。

陈占祥先生一贯重视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大学地理系、福建泉州华侨大学等学校教授。他注重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十分关心青年同志的成长，经常为青年无私地传授学术经验和教授英语，积极为我国城市规划事业培养人才，为促进我国建筑与城市规划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占祥先生曾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八届、第九届人民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第一、二、三、四、五届顾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届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第八届中央四化服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常务委员、第十一届顾问；中国建筑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候补理事、第五届常务理事，第六、七、八届名誉理事；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会员。

陈占祥先生 1951 年 12 月 29 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社会民主进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陈占祥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国是，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以满腔热忱投身于国家建设和城市规划事业，对工作勤勤恳恳，作风正派，为人坦诚；他坚持原则，胸怀坦荡，不计较个人得失，对于历史上不公正待遇，忍辱负重，坦然面对，无怨无悔，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陈占祥先生在建筑与规划专业理论上有很高的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国内外建筑与规划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完全奉献给了我国的建筑规划事业，为创建和发展我国城市建筑规划学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1 年 3 月 22 日上午 10 时 5 分，陈占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 85 岁。

(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稿)

陈占祥自传

陈占祥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上海江湾五角场兴建了新上海市中心。一片宽阔平地上突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中国宫殿式市政大楼。在象征着殖民地式的西洋建筑充满于市的旧上海，这是令人振奋的场面。在它面前，我感到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我暗下决心要走设计人董大酉先生的道路，要当一名造房子的工程师。当时我以为建筑师和工程师不过是一通称而已，都是为了盖房子。上海人那时称建筑师为“打样鬼”，我不想与“鬼”联系在一起，当然更不愿当一个“鬼”。

1935 年我考入上海雷士德工专。这是一所根据英国人、一位已故建筑师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遗嘱创办的工业专科学校及其附属高中。该校小至粉笔，大至机械设备以及教职员工全部来自英国，并自称为远东第一流学府。按英国传统，新办高等学府，在一定时期内无权颁发学位，因此学校鼓励学生争取考伦敦大学海外学位（B.SC, London External）。为此学校设有高中，这实际上是职业高中，重点是培养学生报考伦敦大学。海外学位考试首先要求通过伦敦大学入学考试。这是难度相当高的英国大学入学统一考试。英文考试难度特别高，与今天托福英文相比，简直是大学生与小學生之差。其余两次考试，中间与最后两场，相对地比较容易。

入学后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见到任何学习房屋设计的课程，而木工、水暖、机械等车间实习倒不少。原来课程是按施工而设计的，课程也包括工程量计算和施工说明书。主讲老师是一位利物浦大学毕业

的建筑师——海顿·密勒先生（H·Miller）。从他讲课中我发现了建筑师的职责以及他的至高权力。这时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当时称建筑师为“打样鬼”，滥用权力的建筑师确实是可怕的“鬼”。从与密勒先生接触中我理解到，原来建筑师并不是工程师而是一位艺术家。1936年伦敦大学第一次在上海举行入学考试（Matriculation），我侥幸通过了考试，成为雷士德第一个取得入伦敦大学资格的学生。1937年日本人进犯上海的战争爆发，学校位于虹口战场，被迫停办。同学们由学校安排到圣约翰大学与交通大学。我准备去英国读建筑学。这是密勒先生的建议，并为我推荐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School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以下简称“利大”）。那时，利大确是处在最盛时期。利大毕业生多是英国当时建筑界中佼佼者。1938年8月我由上海去英国，临行的前一年中我请密勒先生辅导我建筑学。他教我渲染、透视、投影等基本功以及建筑历史理论的一般常识。他也出题叫我做快速设计并对我的作业深表欣赏。这时我才对建筑有初步了解，并发生兴趣，因为我从小喜欢书法和绘画，在校成绩相当不错。我在中、小学的美术老师是钱君陶先生，所以学得也较扎实。这一年的准备工作后来证明帮助很大。在利大第一年我班有同学六十余人，第二年就淘汰一半，不少人学得没意思自动弃学。主要原因是多数同学只知建筑很有趣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一发现不是自己的志趣而退学，或不知如何下手学习，功课跟不上被劝退。大学功课五花八门，对于一般学生大多是陌生的，让学生应当有机会认识各种课目的内容，以便在大学前做出抉择，不要进了大学后再摸索或者硬着头皮读下去。这一抉择是终身大事，不能等闲视之。

1938年利大秋季新学年开始的一天，校长尼尔·麦克纳尔爵士在与外国新生座谈会说了一段话，决定了我以后在英国的学习生活。他说：“你们不远千里来英国念书，如果仅仅为了念书，则大可不必，你们在国内同样可以念你们要念的书。既来了，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你们要了解我们（英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同样地你们要让我们了解你们。世界人民互相了解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途径。”当时，世界

大战的乌云密布，欧洲局势极其紧张，他的话是寓意深长的。

利大建筑学院出我意料之外的是对绘画根本不重视，没有水彩画课程，学生只要能表达自己的设计意图，采用任何表达方式都悉听尊便。作业制图但求准确，不求图画美，甚至连阴影也不鼓励画。功课分课堂与设计室两部分。课堂讲课又分两部分：一是建筑历史与理论，二是建筑工程与技术。历史与理论贯串五年，而技术部分每年随设计室设计课题的改变而改变。如房屋构造，先从砖瓦木构造开始逐渐随设计课题的提高而提高到钢筋混凝土、钢结构构造以及相应的房屋设备。课堂与设计两门，如后者不及格就不能升级，课堂部分考试如有不及格的可在下学期补考，但历史与理论例外。如果历年成绩不佳，就不能毕业。所以学习重点在设计室，时间比重也最大。设计室是学生日夜工作的地方，每一设计室称为 Studio，面积很大，高低班学生都在一起。每一班级有两名指导老师，高班同学也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们当仁不让地使唤低班学生跑腿，有时帮他们绘图。我曾帮过一位以色列、一位土耳其同学，为他们的毕业论文绘施工图而度过好几个不眠之夜，通宵达旦，帮着赶论文的施工图。高年级同学使唤低年级同学是英国大学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设计室内各年级同学互助帮助、磋商，促进学习兴趣与提高。每一设计课题交卷后由老师对学生的设计进行公开评图。有时还请校外建筑师参加，如果设计课题的专业性较强，如医院、音乐厅等课题。评图时学生可作辩护，因此是大家最盼望的时刻。Studio 是全校最活跃的地方，晚上往往通宵灯火，这是建筑系的特征。

课程讲课最重要的是历史和理论，由系主任，即学校唯一的教授主讲。其他的高级讲师（等于美国的副教授）有时也教授历史理论课，当时每周最多的学时三小时。课堂气氛轻松，如时间不够，下课后我们一班人同老师一起转移“阵地”，到咖啡室继续讨论。当时利大建筑学院教授是白顿（L.B. Budden），他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学者，极能理解人。我想象他与十九世纪的威廉姆·莫里斯很相似。他从不教条式地对待任何建筑问题，经典的或现代的一视同仁。我一班

中有一位同学酷爱英国乔治恩时期建筑，他所做的作业总是“乔治恩”，同学们往往嗤之以鼻。白顿教授却往往通过这位同学的作业，在评图中给我们讲析乔治恩建筑，使这位同学和大家更提高一步。后来我们也欣赏乔治恩了，建筑水平提高了，发现那位同学许多长处。

同学们在设计中，主要倾向仍是现代建筑。英国现代建筑运动的一位名建筑师麦克西维尔·法拉（Maxwell Fry），他就是利大校友。在现代建筑风尚席卷建筑界时，前面提到的那位同学出于自己信念，仍专心于“乔治恩”，但还能与大家“和平相处”互相尊重。这不能不承认利大学风是难能可贵的。

第一学年开学不久，我应附近的历史名城考斯特（Chester）一个古老的民间团体（Toch）的邀请，做了生平第一次英语公开演讲，讲题是“中国抗战”。接受了邀请，我的心情是忧心忡忡，非常害怕，最后还是讲了，而且受到出我意料的欢迎。此后，又陆续收到利物浦市的民众团体，如“圆桌会”（Round Table），扶轮社（Rotary Club），克利甫斯夫人援华基金会（Lady Crips'Aid to China Fund）等等的来函邀请，二年之后，我已有了小小报告人的名气。但我不可能获得国内战争任何鼓舞人心的资料。同学中有几位英共党员，他们给我一本刚刚由英国左翼出版社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s Over China*），读后我才知道，我们中国还有这么一支部队——八路军和广大人民一起正在进行真正有效的抗日战争。斯诺使我振奋，使我加强了对抗战必胜的信心，除了头几次演讲外，以后我所有的讲演资料都是从《西行漫记》发挥来的。1988年秋季，我有幸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大学担任“埃德加·斯诺”教授。这是我梦想不到的荣誉，而且能有此机会向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美国友人表达我的最崇高敬意。1987年11月我去美国前，我到过延安枣园，我跑到毛主席会见斯诺的地方默默地向两位伟人致敬。

英国大学都设有一个大学工人业余讲习班的组织，目的在于向工人和各阶层人民免费传播知识。这就是 University Extramural Board For Workers' Education。它的讲师团由大学的教授和讲师组成。作为在校学

生，我却被破例地列在该名单里。各民间团体可在名单上挑选他们想邀请的报告人去讲演。以后的四年内，我是该讲师团中接受邀请最多的一个，最多时每周有三次应邀演讲。起初讲的最多的是中国抗日战争，后来也讲大家当时关心的战后建设问题——城市规划与住宅问题。在我八年利大和伦敦大学学习期间，我大约做了五百多次演讲，接触了成千上万听众，其中有工矿工人，社会各阶层人士，家庭妇女，中小學生，各国部队。当日本投降消息传到伦敦时，那天上午我正在美国大使馆演讲，演讲开始后只说了几句开场白，我的讲话被特大新闻所打断，我被听众从讲台上抬出来到格罗斯凡那广场上，加入欢庆的人群，一同庆祝胜利。

由于公开讲演与讨论，我的口才无疑有了很大的提高，与1938年不能同日而语了。1942 - 1943 学年度利大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竞选，我被同学提名参加竞赛，居然当上了利大第一位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外国人——一位中国学生。1942 年波兰流亡政府在利物浦大学、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分别为波兰部队中荣立战功的将士设立了建筑、法律和医学三大系。利大建筑系的波兰建筑学院除某些课用其本国语讲授而与我们分开外，英、波同学都在一起学习。波兰同学天生英俊，军装上挂满军功勋章，口袋又较英国穷学生更是鼓鼓的，加上风度非凡，一时成为全校女同学的追求对象，男同学因而大为愤慨，一时成为校内的不安定因素。作为学生会主席，我举办了英国当代美术家作品展览，邀请著名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又通过为前利大建筑学院创始人赖雷爵士授勋之际，邀请他返校并组织盛大联欢晚会等等，旨在纠正波兰同学对英国文化传统的偏见。欧洲人对英国人都抱有类似偏见——在欧洲人心目中，英国人保守，在艺术上无论在过去与今日总是落后于欧洲——从而使双方彼此接近一些。通过接待赖雷教授使波兰同学能了解学校的过去成就。此后又通过一系列个人接触，双方同学相处融洽，学习相互促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数年利大建筑系毕业生中人才辈出，如詹姆斯·斯特灵（James Sterling）、考灵·罗（Colin Rowe）、劳勃脱·麦克西维尔（Robert Maxwell）等。后两位在我

任学生会主席任内，是我的积极支持者。英国建筑界今天不少人认为这一时期是利大建筑系的“丰收年”（Best Vintage Year）。这是与利大目前情况相对而言的。

在战争年代，利物浦市每天有上百名在协约国商船船队中服务的中国海员在市里等候下一班的船队出航。我们中国海员是作为参战国的服役而对待的。但我们海员们很长时间内都是被遗忘的人们。我于是找利物浦市内英国几家最大海运公司（如太古、亚细亚等等）和英国战时海运部等机构，要求他们关心中国海员福利。他们让我创办中国海员俱乐部。1942年俱乐部成立，由海员中挑选经理等职，我任秘书长作为与英国方面的联系人，并负责组织各项文娱活动，如足球赛、旅游、电影、舞会等等。我认识了许多海员同胞。战争中我国海员在海上牺牲达十余万人。他们是为世界反法西斯献出生命的，是中国人民在世界大战中所付出代价的一部分，但他们事迹在今天可说是几乎无人知晓。

当时我国海员日常活动中心是在原利物浦华侨集会的地方，壁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这一地段被认为是市内的一个贫民窟。1943 - 1944年，在我结束五年建筑专业学习后，就读城市设计专业（Civic Design）硕士研究生，我决定以改造这一地区为“中国城”作为纪念我国牺牲的海员并为以后华侨准备一个较好的居住环境。当时尚无旅游事业，但战后旅游的发展已为人们所认识。如果“中国城”能实现，无疑将会为我国侨胞带来工作机会。因此，决定以利物浦“中国城”作为我的硕士论文设计。1944年夏我刚刚通过论文答辩，美国合众社立即发出通讯，消息传播全世界。后来英国泰晤士报又发表了详细报导（1944年7月份）。利物浦一家地产商还准备为“中国城”投资，条件是与中国政府合资。但当时中国驻英使馆表示政府无力承担。如果成功，这是第一座有计划的“中国城”。

我对中国建筑与城市设计并无系统地学习过。1942年暑假我是在剑桥大学度过的，那年李约瑟教授由重庆回到剑桥，准备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我有幸见到他并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他告诉我研究中

国建筑要从中国固有文化着眼，不能用西方标准来研究中国建筑。又告诉我《古今图书集成》是部伟大文献，我可从那里找到研究线索。这一假期，在剑桥大学我阅读了这本我国文献巨著，得益匪浅，从而形成了我对中国建筑理论的一些看法，并写成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在英国《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主编、已故尼格拉斯·潘胡斯爵士（Sir Nicolas Pevsner）的指导下正式撰稿，发表于该刊物 1947 年 7 月份的“中国专刊”上。

20 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因我的工作重点移到城市规划，对于我当年的基本观点没有机会继续研究而发扬之，深为遗憾。今天我仍认为，中国建筑为其特定的文化传统所决定，我们对建筑的价值观、艺术观，为对我们建筑的使用和欣赏要求、技术条件以及其它物质环境要求所决定。只有明确我们文化的特性才能正确评价我们自己的建筑。世界建筑宝库因为中国建筑的独特贡献而更丰富。对中国建筑无视其特性而生硬地塞在世界范畴内，世界建筑会因此而受到损失。

在探索建筑问题时，我发现中国建筑设计与建筑群是密切相连的，两者互相渗透，不可分割。1943 年我对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作了些探讨，后来发表在利大的《都市计划评论》1945 年秋季刊（Town Planning Review, 1945 Autumn No.,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Press）。经过这一简短的探索，对中国建筑和城市设计我有自己的看法。1943 年我就设计了利物浦中国城。我把这 20 公顷的壁铁街和乔治广场城市的用地筑围墙围起来，进门是一购物院落，由于用地南端高于北端，院落中间留一空地设步阶引到第二个空间，这也是整个构图中的主要院落，两侧为三层楼，楼上两层作为公寓用，底层为店铺。中轴线上的主楼，高三层，是公共建筑，供本社区办公及社区居民的活动中心之用。主楼建在一底座上，稍高于两侧公寓，同时稍稍弥补从第一院落望此楼时的可见高度。主楼后又有两组公寓楼，均为三层，组成后院。四周零星空地，其中一块地下有铁路通过，开有一个空地作为铁路通风之用，四周堆的石块为“山”，布置成一个庭园。墙一律用灰砖砌，这在英国是没有先例的。我坚持灰色，从而可以烘托出建筑部